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合唱活动

——以1958年到1966年的《北京晚报》为例

张岩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合唱具有参与度高、操作性强、感染力大的特点,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众多文艺形式中具备独特的优越性。建国初期的北京群众合唱活动牵扯到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通过对1958年至1966年间的《北京晚报》中关于北京群众合唱活动的相关文本的分析,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谁在唱?唱什么?怎么唱?为什么唱?群众合唱活动兼具表演性与参与性,因而既呈现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符号,表征当时的宏观政治语境,同时又具备极强的群众动员功能,有效地将数量庞大的社会成员集合在一起,达成特定的意识形态宣传目的,甚至发动与辅助群众运动的开展。但政治性并不能遮蔽群众文化运动的其他特征,本文试图从建国初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现代化建设和受众本身的参与行为,来全面考察该时期北京居民的群众合唱活动。

[关键词] 群众合唱活动;《北京晚报》;现代;政治;生产

[中图分类号]:I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4)03-0023-06

建国初期,北京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十分丰富,而群众合唱活动开展得尤为火热。与其他文艺活动相比,合唱具有参与度高、操作性强的特点,能够兼顾内容和形式,同时触动歌者、听者的思想和情感,因而群众合唱活动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众多文艺形式中的典型。合唱兼具表演性与参与性,就参加者而言,门槛低、快感强,就组织过程而言,灵活轻松、可操作性强,赢得了普遍的欢迎。这一时期新政府非常重视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大力提倡推广各种文艺和体育项目。翻阅1958年至1966年的《北京晚报》,就会发现关于文体活动的报道在整张报纸中所占分量颇重,其中集体性文体活动尤为引人注目,如合唱、集体舞、诗会、运动会、游园盛会、各种面向群众的舞台表演等。就群众参与度而言,合唱活动的参与人数最多、普及最广,这或许和“合唱”的自身特点及可操作性有关。

《北京晚报》有4个版面,不时有调整变动,但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一般头版为国内外新闻要事;第2版或第3版介绍科普与历史文化知识,登载文学艺术作品,如散文、诗歌、歌曲、评论、小说连载等,有时会有一些歌词曲谱;文娱、体育活动报道多集中于

第2版或第4版,关于群众合唱活动的报道亦属此列;另有一版多为有关生产活动、技术革新的报道,常在第4版或第2版。后3个版块的顺序时常调动。有关合唱活动的报道虽非每期都有,也相当常见,尤其每年“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及其他节庆前后,伴随着集中的培训排练和联欢演出,相关报道也密集出现。群众合唱活动又被称为“社会主义歌咏运动”或“群众性的歌咏高潮”,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号上就已出现这一提法。

一、“掀起群众性的歌咏高潮”

“群众性的歌咏高潮”作为一种明确提出的固定表述,指的是在政府文化部门的推动下,在北京各级政府机关、各工厂、各乡村(包括后来的公社)中开展的一场学唱、合唱热潮。创刊号第4版即有一篇相关报道:

中央乐团合唱队在东郊区各工厂开展歌咏活动的辅导工作,已从本月十一日开始。除了已经开办的“指挥训练班”以外,他们还将开办一个手风琴训练班和七个新歌传授站,为了给就将掀起的群众性的歌咏高潮,准备一批指挥、手风琴手和教唱新歌的骨干分子。

[收稿日期] 2014-04-02

[作者简介] 张岩(1987-),女,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东郊区一些早有歌咏队的工厂,正在整顿和扩充队伍,没有群众歌咏活动基础的厂子正在着手筹备建队。中央乐团合唱队的八十一个同志决定在后天分别下厂,他们计划在“五一”前能帮助东郊区六十多个工厂建立业余歌咏队,并要教会五万人唱五支新歌^[1]。

报道中的“五支歌”是北京群众艺术馆推荐的“革命人”、“社会主义好”、“东风压倒西风”、“赶上英国”以及“干!干!干!”,是指定的“五一”劳动节游行队伍要唱的歌曲。这场“群众性的歌咏高潮”开展得十分火热,而且组织严密,先由专业文艺团体有组织地培训文艺骨干分子,如中央乐团合唱队、北京群众艺术馆、文化宫、各区文化馆等,然后文艺骨干再负责教唱本单位其他人。同时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相关歌曲的教唱小册子^[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固定时间教唱这5首新歌^[3]。

由于“五一”群众合唱活动非常成功,同年8月14日报道了即将掀起第2次歌咏高潮的通知:

(本报讯)最近,市文化局,市教育局,市工会,团市委,市手工业联合总社,市文联,市学联,市妇联等八个单位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国庆节前在北京掀起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第二个高潮”的通知。

“五一”节前后,全市大约有一百万人唱会了“社会主义好”等五首歌曲。这次要争取全市有一百五十万人再唱会五首歌曲。为此,八个单位向全市人民推荐了一批歌曲,这批歌曲发表在“北京歌声”8月号上面。其中以“红旗歌”,“毛泽东的红旗闪金光”,“歌唱总路线”,“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技术文化大革命”等五首歌曲为主,要求普遍唱会,其余的歌曲可在唱会五首歌后自由选唱^[4]。

这则报道中还给出了“五一”群众歌咏活动情况的一些具体数据,即使不能完全采信,也可作为参考。1958年北京人口630万,百万人唱会5首新歌就意味着6个人中有1个人5首皆可唱,另外必定还有虽不能唱全5首,但会唱其中一部分的,这些人的数量会更多。而经过国庆“第二个高潮”的再次推动,旧的5首歌的普及率必将进一步提高,新的5首歌也会大范围普及,因而合唱活动的规模只能进一步扩大。

群众合唱活动实际是文化跃进的组成部分,“十一”前期,为了向国庆献礼,各单位纷纷立状誓师。西四印刷厂表示要做到国庆节前全厂职工100%参加文化活动,摘文盲帽子,年底自编、自导、自演和新学文艺节目200个以上,年内做到大小型演出200次以上,并配合街道做到诗画满墙。台型机床厂提出国庆前要全厂学会40首歌,其中10首歌100%的人会唱,80%的人学会10个集体舞,并且成立了

文艺大军,厂长任军长,党支书任政委,工会主席团支书任副军长。这些合唱活动的开展“大都是政治挂帅,书记厂长带头,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成立训练班培养骨干,充分抓紧上班前后、饭前饭后、会前会后、课前课后的时间。”^[5]可见正是党组织和行政结构的积极领导、运作,合唱活动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

二、谁在唱

既然是“群众性的歌咏狂潮”,那么参与者当然是群众。“群众”,顾名思义,是数量多、来源广、匿名的一大群人,在那个特殊年代指的就是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的工农兵,而在首都北京这个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工人的角色尤其重要。党组织和行政机构再积极,只能起到宣传带头的作用,而真正促成合唱活动形成规模的,是广大群众的参与。

不同于独唱的突出个人表现,合唱是一种集体演唱,特点是人数多、次数密、规模大、普及性高,而且有组织,上至已经耳背的老太太、下至还说不清话的小孩都发动起来了^①。在《北京晚报》相关报道的标题和内容中处处可见“群众”、“人人”、“个个”、“处处”、“争”、“齐”等字眼。正是合唱这种集体形式,使它能同群众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相对于独唱要求较高的个体表现力,合唱更突出集体协作能力,技术要求低,易学易会,普通人经过简单的学习培训即可迅速掌握。因而它既是集体精神的一种绝佳象征,又是培养集体意识的绝佳手段。

合唱既可以是一种专精的表演艺术,比如专业团体的合唱,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部队文工团、艺术院校文工团等都有自己的合唱队;也可以是业余的兴趣爱好,比如普通群众的合唱,此种更加普遍常见,而且更折射出独特的社会、政治意义。本文关注的重心不是专业团体的合唱表演,而是业余群众的合唱活动;不是群众合唱在舞台上的表演过程,而是其组织操作的过程及其社会政治功能——也就是说,群众是怎样被发动、被组织到这场活动中去的,以及群众对合唱活动的这种参与又将意味着什么。

三、唱什么

群众合唱活动所选歌曲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时代特色,“五一”和“十一”前常会推荐歌曲,并会在节庆之前加紧排练,在节庆期间频繁表演。比如1958年“五一”北京群众艺术馆推荐5首歌:“革命人”、“社会主义好”、“东风压倒西风”、“赶上英

国”及“干！干！干！”；同年“十一”，文化局、教育局、文联等8个单位又推荐5首新歌：“红旗歌”、“毛泽东的红旗闪金光”、“歌唱总路线”、“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技术文化大革命”；1960年“五一”也推荐了“红旗手进行曲”、“三面红旗万万岁”、“跃进要靠总路线”、“人民公社颂”、“跃进年唱跃进歌”^[6]。每次推荐歌曲都会有文化单位组织教唱、电台教唱、音乐出版社编辑歌曲小册子、发售唱片等辅助进行，表现为一个连续系统的运动。

这些歌曲中新歌相当多，《北京晚报》第2版也经常登载新歌的歌词曲谱，比如“反浪费、反保守”、“跃进热潮比天高”，大部分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的总路线、歌颂大跃进、赞扬生产劳动之类的，在美国入侵黎巴嫩、伊拉克反抗美国、美国进入台湾这些事件发生后，也都很快有相应的表达对美帝愤怒的歌曲，时效性强，政治色彩浓。

歌曲内容大致分为两种：一为生产，如“反浪费，反保守”、“干！干！干！”；二为政治，如“社会主义好”、“公社颂”。这种分类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基本上所有歌曲都包含政治内容或以政治统摄。生产类歌曲往往也包含政治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歌曲多为生产和政治兼重，如“大跃进”，生产这一经济活动被赋予浓重政治色彩。政治类歌曲多宣传和颂扬国家意识形态，如“歌唱总路线”、“社会主义好”、“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我们是红色青年”等，也有一些反映国际意识形态的对立局势，甚至有颇强的战斗性，如“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7月西方对中东地区行动和涉足台湾问题时，“英帝国老狼发了疯”、“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制止美国侵略”、“全力支持黎巴嫩人民”、“歌唱伊拉克”等歌曲显然是配合当时国际背景和外交策略的，不过传唱度并不高。

四、怎么唱

合唱，有自娱自乐型的自发合唱，也有各种非正式的合唱表演，还有隆重登台的舞台演出和合唱比赛。建国初期文艺会演、联欢十分频繁，大部分联欢会、文艺会演中都能找到合唱节目，有时候合唱还会和戏剧、曲艺、独唱等其他节目结合起来表演。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在双休、节假日经常举办大型文艺游园会，歌舞节目必不可少，合唱以其灵活的形式和独一无二的感染力，成为调度节目安排、渲染现场气氛的极好方式。即使在平时也有许多人在各公园中、在单位、在居住小区排练合唱。

合唱的形式灵活多样，可以三五人小合唱，也可

以数百人大合唱^②，可以在田间地头、生产车间的劳动间隙表演一番，鼓舞士气，可以穿插在综合联欢晚会中暖场，也可以举办大型的合唱比赛同台竞技，还可以在课堂、会议、集会中间即兴进行。譬如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工人组织的百人业余合唱团，他们“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活动。如会前、会后、饭前、饭后，甚至利用交接班的时候集中演唱。在劳动中工歇的时候练习”^[7]，这就既保证了集体合唱的时间，又充分体现出灵活性。有一则报道描述了儿童剧院牵头的群众文化工作队，在通州镇动员建立人民公社的大会上，教群众唱“人民公社好”，不到半小时会场4万多人就齐声高歌，并称“简练的歌词大大鼓舞了群众，使他们明确了公社的性质和好处，更坚定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心。”^[8]这样的场面和声势不能不说十分罕见，而且也恰巧证明了，合唱活动可以被作为动员群众接受某种政治观点、参加某种政治活动的有效手段。

如前面所提到的，群众合唱活动的组织十分严密，每年都会有官方的文化单位提倡、推荐歌曲，由官方出版单位出版推介歌曲作品，由各级文体组织文艺骨干层层教唱，广播电台教唱，并由各级党委、行政领导组织，由各种官方或民众自发的文娱组织团体集体排练，最后在平时自发开展或正式举办的文艺活动或文艺比赛中演唱。在很多条件较好的团体的合唱队中，还配有指挥、伴奏，能够达到较高的演唱水平，这得益于文化单位的专门培训以及群众自身的频繁排练。耐人寻味的是，一般担任合唱指挥的不是文艺积极分子，就是单位领导^③，盖因“指挥”一词、一职本身就具有指导、领袖的隐喻内涵。

有一点格外引人注目，即从日常排练的组织形式看，常常以生产单位为来操作，特别是在工厂中，也有以合作社、机关单位为组织单位的。除此之外，还有的合唱活动是街道居委会组织的，以居住区域为准，按街道、小区等组织；以及出于兴趣自愿参加的合唱组、俱乐部等，也非常普遍，且很受欢迎。

作为一场群众活动，与党组织、行政机构挂钩无疑使合唱活动具备官方性质，并因而能够调动各种资源服务于活动的开展。虽然从文献上看，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运作领导主要以鼓励发动为主，但也不难想见这种官方、半官方色彩会极大影响参与者的心理。而且这种鼓励和影响并不仅停留在空洞的荣誉上，个人参加合唱活动的态度和政治态度挂钩，单位文艺活动的开展情况和集体荣誉、集体利益挂钩^④——不积极参加配合即是思想有问题。

五、为什么唱

我国古代很早已经注意到音乐歌咏对人的情感的激发作用,荀子在《乐论》中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为什么呢?因为音乐特别能牵动人的感情,“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乐记》则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对音乐的政治功能的认识。而“唱”,比之于单纯的音乐,主题和内容更明确、更丰富;比之于单纯的文字,它能更有效地感染激发人的情绪,并且容易记忆,也更让人感兴趣。因而“唱”容易推广普及,并能够极其有效地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思想、激发情感。

虽然“唱”的历史悠久,但是“合唱”实际上是一种很“现代”的东西,并且从其形式上看主要借鉴了西方音乐的形式。而出于政治目的对合唱活动的利用也取自西方经验,历史上国内外的近代工人、学生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乃至日常的学习劳动中都频繁出现合唱活动的踪迹,其卓越的动员力量也得到充分展现和证明。从工农运动中出身的共产党在建国后继续以群众合唱活动辅助政治运动。除了合唱,建国初期群众集体活动还有集体操、集体舞、运动会、赛诗会、晚会、会演等,参与人数多,规模大,但就参与度来说能与合唱媲美的,恐怕只有集体操。

然而如果仅仅把群众合唱活动的意义理解为政治功能,必然有失偏颇。那么群众合唱活动到底是为什么而唱呢?

(一)政治目的:“结合当前生产和中心工作”^[7]

“中心工作”即特定时期的主要政治目标和活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文艺工具论”倾向,从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到鲁迅意欲以文艺治愈国民精神、再到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内核一以贯之。群众合唱活动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如一则有关北京各区文化工作会议的报道,其标题即为《文化工作为政治、为生产服务》^[9]。而促进生产的目标,同样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政治诉求。

“歌唱”的引申义是颂扬,因而合唱活动就十分契合新政权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无论是歌曲内容还是“唱”这一活动本身,都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着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大量颂扬大跃进的歌曲。

相对而言,合唱活动发动群众的范围最全面、程度最深入,几乎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运动,在合唱中似乎所有人都被歌声和歌词裹挟推动,营造出

一层意识形态的魅惑幻象。甚至在组织过程中,通过对个体业余时间和空间的渗透和支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大众、掌控社会。“在家做饭、洗衣时唱歌,到街道开会时唱歌。到处都是欢快的歌声。”^[10]这非常接近于阿伦特所说的意识形态对私人空间的渗透,在家做饭、洗衣时也不能沉浸在私人生活的自在状态中,仍然暴露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

(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北京晚报》除了各种文化活动的报道,体育方面的新闻也特别引人注目,有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赛事报道,也有在普通民众中间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的追踪,还有关于做操^⑤、游泳、乒乓球、锻炼一类的推广宣传。其中多次宣传“文化革命”——这当然不是对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未卜先知,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文化”上的革命,如扫盲、科普、鼓励学习、推广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等。这段时间的《北京晚报》上,除了政治内容和生产报道,科普扫盲、提倡文体活动是重中之重,启迪民智的色彩非常强。

民国时期亦有识字扫盲等启蒙活动,但不如新中国成立后力度大、效果明显,可能原因是新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和组织能力大大提高。而作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农兵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空前强调普通民众接受启蒙教育的权利,并能通过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政权机构和半民间、民间组织推行政策,为开展这些文体活动引导、助力。

同时,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群众合唱活动的开展,为其具体操作运转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报纸、电台已经非常普及,许多单位已装有电话,方便传达政策、传播通知;市内交通越来越方便,有轨电车逐步被无轨汽车所取代,更灵活便捷,方便培训、交流和会演。另外,音乐出版社配合发售的唱片,每张播放歌曲的时长由7分钟大幅提高到33分钟^[11],电视也在起步中。

群众合唱活动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动员的目的,本身也是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推进现代化的举措,这就必须把合唱活动看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它是提高公民素质、塑造现代人之重要途径。人口素质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资源,保障民生、发展医疗教育事业、甚至开展文娱体育活动都是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措施。这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化。因而,包括群众合唱活动在内的许多新中国初期的普及活动,都带有较强的启蒙色彩,实际上是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

“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什么呢？除了我们平时所说的启蒙、自由之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或许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优质劳动者——也就是说，学习娱乐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生产。一个国家的资源除了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水、矿产等，还有人口资源，而决定人口资源的除了人口的数量，还有人口的质量。在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城市是否强大的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即使在今天，人口数量也决定了劳动力是否充足，比如中国这几十年就受益于劳动力充足，而西方一些国家却为人口负增长而苦恼；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质量，换而言之就是劳动力的质量。

而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将生产和政治结合，二者关系十分紧密复杂。如1958年7月1日头版头条《四十万人辛勤劳动向党献礼，十三陵水库大功告成，今晚盛会现场祝捷，八方歌舞欢愉英雄》，就是生产、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表现。现代社会通过各种生产组织将人安排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并使他们被组织进整个社会。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由于政权机构、政党组织对生产组织的全面渗透和控制，二者合为一体，每一个生产的人也是政治的人，同时，每一个政治的人也都是为了生产。

（三）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和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

不同于政治观点的直接性，文化通过一种更间接、更温和、更稳定、也更全面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特殊的习惯、礼仪、道德、举止和人工制品，它们涵盖了跨越几代人的常识、累积起来的智慧和共同体的集体记忆。用这种方式，它们表达了特定集体及其个体成员们与其他类似集体形成对照的世界观和情感。”^{[12][14]}群众合唱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新的行为和文化，来塑造并强化关于新中国这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的技术不仅有科学技术，而且有管理人的技术，通过仪式、制度、文化习俗等细节之处能够达到规训人的目的。因而通过“知识”、通过文明行为、通过文体活动，能够塑造一种“新人”——即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可以将新中国初期的群众合唱活动看做一种仪式，在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下，这种仪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渗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它的不断重复来强化和塑造某些意识形态内涵。每一次群众合唱活动都是一次礼拜仪式，歌唱祖国、歌唱

党、歌唱劳动、歌唱社会主义，通过重复和强化将制造一种全面、自然的氛围，将社会成员包裹其中。合唱的情感感染力和集体效应，尤其适用于培养和加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新政权对民族主义的有意识利用，但这已经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因为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需要用一种超越狭义种族—民族的观念来增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建构政策，旨在使公民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认同和共同的文化”^{[13][240]}。无论是唱文明、唱和平、唱劳动，还是唱党、唱跃进、唱社会主义，实际上都已经摆脱了根植于血缘和种族差别的种族—民族主义，是在通过脱去“民族”色彩来建构一个新的国家—民族。特别突出的是，在群众合唱活动中有许多针对意识形态对立国家的歌曲，通过激发对这种“他者”国家的愤怒和仇恨，来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的认同和热爱。“国”取代了“族”，但却仍然发挥着民族主义的神奇魔力。在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虽非浓墨重彩的主角，群众合唱活动至少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而且颇有意思的角色。

通过前文可以看出，新中国“十七年”的北京群众合唱活动的蓬勃开展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动密切相关，并因此呈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局限性；同时，还应当将其置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与文明演进中去考察，群众合唱活动不是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伴随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产生的，是当时北京市民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十七年”的北京群众合唱活动的研究，除了重视其中的政治内涵，还必须关照政治之外的视角，进一步从现代社会语境、合唱组织形态、操作方式、发生空间、个体经验等角度切入历史，才能全面把握群众合唱活动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化进程的双重作用下、政治力量与日常生活的双重维度中的特征和性质，才能细致厘清群众合唱活动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及在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

注 释：

- ① 譬如《北京晚报》1959年3月6日第3版中就有一则报道介绍了有朝阳门街道的老大娘合唱队，“十几位老大娘，一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最老的七十五岁，已是满头白发了”，可见当时的群众合唱活动发动范围之广。
- ② 《北京晚报》1959年5月3日第2版《首都大学生火热开展多种多样文化活动：歌唱五四，歌唱祖国，歌唱力量》。

记述了北大、清华等 7 院校组成了 2000 人的大合唱队,用来演出革命歌曲大联唱。

- ③ 如《北京晚报》1959 年 2 月 24 日第 2 版《群众文艺会演一浪高一浪:丰台区会演结束,建筑一公司又开始》中写道:“由党、行政、公会、共青团干部组成的合唱队,表演大合唱‘英雄们战斗在天安门’。第一分指挥部工会主席温留卫担任了指挥,职工们在这个合唱队里看到了他们熟悉的分党委书记霍景林,副书记陈熙凤。”
- ④ 如 1958 年 11 月 4 日第 2 版通讯《用各种文艺活动有力地推动大生产:宣武区举行文艺会演,马连道仓库、第 33 缝纫社等 9 单位被评为红旗单位》,报道了会演中的评奖情况。毫无疑问这种评奖措施也会极大地刺激单位和个人参加群众合唱活动的热情。
- ⑤ 《北京晚报》1958 年 6 月 6 日第 4 版《天天做体操,人人会唱歌——裘家街居委会居民一片新风》中称该居委会“居民按地段分成 6 个体操、歌咏小组。每天早晨 7 点半、下午 4 点半时,大家先扫街、泼街,然后作体操、学唱歌。……在家做饭、洗衣时唱歌,到街道开会时唱歌。”使得做操和合唱活动深入居民区,深入日常生活,并且活动非常有组织、有规律,定址定点。

【参考文献】

- [1] 中央乐团下厂教唱 [N]. 北京晚报, 1958-03-15.
[2] “五一”唱五支歌——各区文化馆教唱忙 [N]. 北京晚

报, 1958-03-31.

- [3] “五一”新歌, 电台每天教唱 [N]. 北京晚报, 1958-04-19.
[4]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歌咏运动, 国庆节前再次掀起高潮 [N]. 北京晚报, 1958-08-14.
[5] 挑战和应战, 报喜表决心, 西城区文化跃进大誓师 [N]. 北京晚报, 1958-08-30.
[6] 推荐五首新歌迎“五一”, 书店发售唱片, 电台介绍教唱 [N]. 北京晚报, 1960-04-08.
[7] 百人业余合唱团 [N]. 北京晚报, 1960-04-29.
[8] 四万人齐唱人民公社好 [N]. 北京晚报, 1958-08-31.
[9] 文化工作为政治、为生产服务: 本市各区召开文化工作会议 [N]. 北京晚报, 1958-12-8.
[10] 天天做体操, 人人会唱歌——裘家街居委会居民一片新风 [N]. 北京晚报, 1958-06-06.
[11] 首批慢转密纹唱片问世, 本月中旬可与听众见面 [N]. 北京晚报, 1958-10-09.
[12]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M]. 叶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 威尔·金里卡. 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和公民 [M]. 邓红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Study on Mass Chorus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Days of P. R. China ——Taking *Beijing Evening News* from 1958 to 1966 for Example

ZHANG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9)

Abstract: With features of high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simplified operation and great appeal, the chorus equipped with unique advantages among many art forms in “service for the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The mass chorus activities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days of P. R. China involved many aspects, including social aspect, historical aspect, political aspect and cultural aspect. Based on the associated text analysis of choral activities of Beijing Masses in *Beijing Evening News* from 1958 to 1966,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are singing? What to sing? How to sing? Why do they sing? Mass Chorus activities are of both performa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Thus they not only presented as a distinctive political symbol which showed the macro-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time, but also had a very strong function of mass mobilization which effectively gathered a huge number of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gether to achieve a specific ideological propaganda purposes or even to launch a mass movement. But other features of the mass cultural movement should not be shielded by its political features. This paper tries to fully investigate the mass chorus activities of Beijing resident of that peri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influe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P. R.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audience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mass chorus activities; *Beijing Evening News*; modern times; politics; production

【责任编辑 阿茹汉】